

关于“丝绸之路古印”

潘敏钟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古印”在我国印学界由笔者首次提及，但国际印学界是否已将此为公认的称谓，尚不得而知。笔者所知其提法见于日本新关钦哉1995年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至于是否为新关氏所首称尚待进一步核定。

笔者通过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的前三次中亚学术探险考古，将他的翔实的发掘报告《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有关印章的所获及研究详细刊录。与此同时，笔者再结合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考古发掘、征集及20世纪初西方多国如瑞典斯文·赫定、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彼德罗夫斯基及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等相继在中亚探险考古发掘所得，这样，总共搜集到的“丝绸之路古印”数量相当惊人。这些印章有东方图式、文字印；西方图式、文字印（古伊朗萨珊王朝的印、希腊古典时代印、罗马帝国的印、印度风格印等等）；有铜质、木质、玉质、骨质、石质等等；有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等，总而言之，相当庞杂。并且这些印章有其从民间收集，也有发掘而得，年代有汉代或其前后时期。该类印之丰富，全球绝无仅有。

该类“丝绸之路印”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成果，认为：1. 我们汉代是普遍使用木印的。2. 一些半成品木印的发掘，揭示了古人如何制作、刻制木印。3. 中国印章与西方印章的关系相当复杂，难以理清。4. 对日本人新关钦哉“肖形印属于西方系统”及“中国的印章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的观点，用事实提出了疑问。5. 对著名的“司禾府印”，笔者提出其为伪印的观点及理由。6. “丝绸之路印”的提出，为我们的印学研究走向广泛、深入而科学提供了铺垫。

关键词：西域 丝绸之路 古印章

笔者在撰写《斯坦因西域所获印具研究》一文时，得见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0—1931年间四次中亚考古、探险，在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所获的大量印章。笼统地说，这些印章有东方图式文字印、西方图式文字印；有铜质、木质、玉质、骨质、石质等等；有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等，相当庞杂。这些印章既有从民间收集的，也有发掘所得，年代则为汉代或其前后时期。笔者据此结合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考古发掘、征集及20世纪初西方多国如瑞典斯文·赫定、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彼德罗夫斯基及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等相继在中亚探险考古发掘所得，收集到的印章总数量相当惊人。这些印章出自我国境内，因而也应是我国印章大家庭中的一员。但这批印章在我国考古界、印学界一直未能被归类，或者说缺少一个大家大致认可的称谓。

西域的地理位置存在于世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这个通道上为经贸交往、政治统治而存在的印章，笔者认为应统称作“丝绸之路古印”还是非常妥切而科

学的。

“丝绸之路古印”（Silk Road古印），笔者所知其提法见于日本人新关钦哉1995年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至于是否为新关氏首称，尚待进一步核定。

一、有关前人“丝绸之路印”的收集整理及讨论

这里先说明一下，在我国的印学研究领域将“印章”与“戒指”独立开来，而国际印学界将二者联系得密不可分，所以，笔者整理时包含了指环印。

指环印（即“戒指印”、“戒指”），就是指环形钮印章，产生于埃及。埃及中王国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由古老的圣甲虫印变种而来的指环印。原先的圣甲虫印章上必须开有纵向的孔，细绳穿过孔可以挂在衣服或脖子上，还可以扣在手指上。后来，古埃及人又将绳子改成金属质，于是有了戒指印的雏形。第十三王朝时期，指环印的印面可以旋转，印面与钮环体通过螺钉链接（图1）。到了十八王朝时，由旋转式改为固定式，与此同时，圣甲虫的形象彻底消失。指环印整体由金、银、铜等制成，铺面上刻以名字、职务以及格言。印章是信用凭信的象征，我们今天的风俗中，男人将代表自己的重要凭信物（印章）——戒指送给女人，意味着这个女人可以代表自己的一切，于是，婚约也就成立了。这就是全球公认的结婚送戒指风俗的由来。据载，《旧约·创世纪》第41章41至42节里有埃及法老摘下戒指、戴在犹太人约瑟手上的记载。犹太人是商业游走民族，甚重视戒指印。顺便提一下：斯坦因所获的大量戒指印，和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有多大的关联，这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古印”的一个课题。

（一）斯坦因的印章

斯坦因前三次中亚学术探险考古，均有翔实的考古发掘报告，分别为《古代和田》（图2）、《西域考古图记》（图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图4）。下面将其中有关印章的所获及研究详记如下（印章编号尊重原著，用原编号及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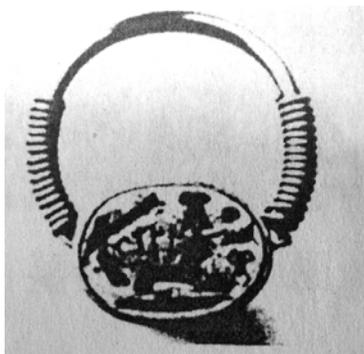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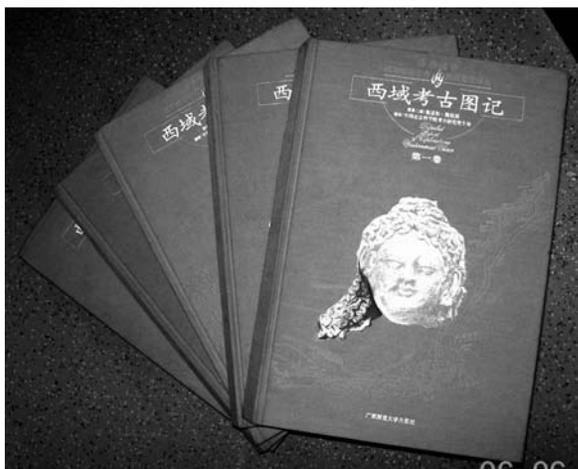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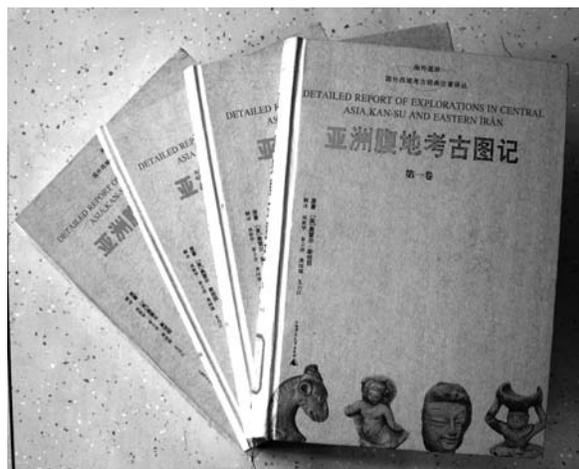


图4

1. 《古代和田》^① 记载所获印章 (图5—7)

主要包括皮山附近获得的印章、墨吉村民送来的托古加依遗址中的印章、在约特干当地买到的文物中的印章、和田城获得的文物中的印章、尼雅遗址流沙中发现的印章、阿克塔孜遗址发现的戒指、乌尊塔提发现的戒指、拉庆阿塔附近古遗址中的印章、吐噶墩的遗物中的印章、在(或据说在)杭桂塔提发现的印章、据说捡自阿克苏皮尔的印章。

2. 《西域考古图记》^② 记载所获印章 (图8—14)

主要包括购买或出土之约特干的印章、和田城搜集之印章、自基内托克玛克获得的古物中的印章、阿克铁热克及斯也里所获的古物中的印章、穆拉霍加及其他人自咯达里克遗址带回的印章、自达玛沟一带的遗址(有些可能是从咯达里克遗址)中所带回的印章、N.XII及其附近出土的器物中的印章、N.X III出土器物中的印章、N.X IV.III出土器物中的印章、废墟N.X V~XXI出土器物中的印章、废墟N.X X VI中发现的器物中的印章、东南废墟群N.X X VII—X X X V出土或从其附近发现的器物中的印章、尼雅遗址发现的各种器物中的印章、伊布拉克主要是在N.X X VIII发现的印章、安迪尔废墟房屋中出土的物品中的印章、安迪尔唐堡及其附近的出土物中的印章、废墟L.A.I内和附近出土的器物中的印章、废墟L.A.VII.VIII.IV发掘或其附近发现的器物中的印章、废墟L.B. I~III中发掘的器物中的印章、吐蕃戍堡M.I出土的器物中的印章、T.XIV坞楼遗址发掘的器物中的印章^③、T.XX烽燧和T.XXI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印章、T.XXVI烽燧和T.XXII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印章、T.XXVII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印章、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出土遗物中的印章、柯坪南部废墟地采集的遗物中的印章、可能发现于库独浑附近沙漠的遗物中的印章。

① [英] 奥雷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根据译本逐条统计抄录。

② [英] 奥雷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刘文锁等译《西域考古图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译本逐条统计抄录。

③ T.XIV.木印, 方形小块, 有穿孔。制作精美。印面上有“长寿”两字。背面右侧有一“寿”字, 未刻完。参见T.XXVII.15。图版LII。著作中, 斯坦因均以现代考古学的要求进行详细记载, 此处略记一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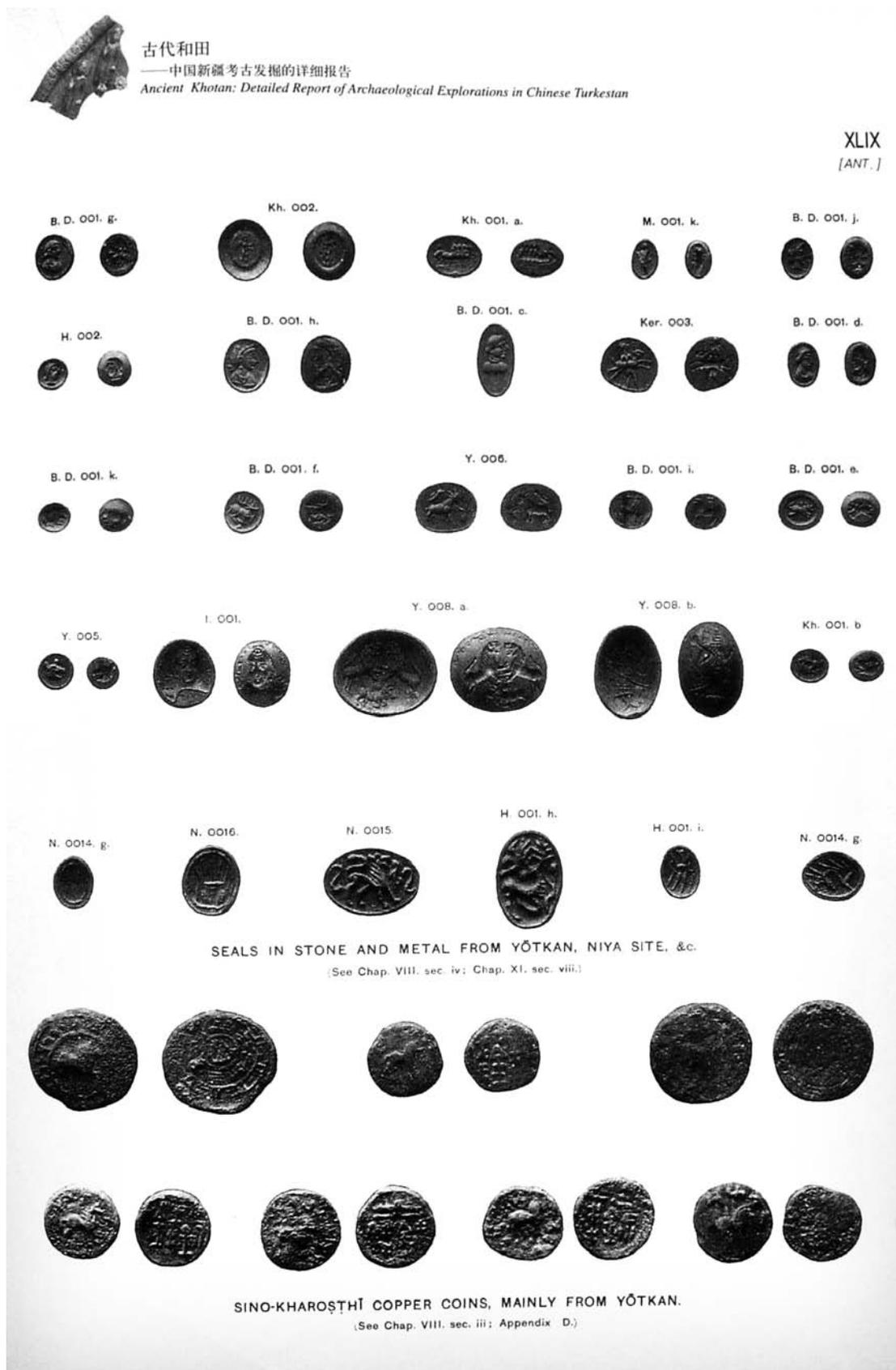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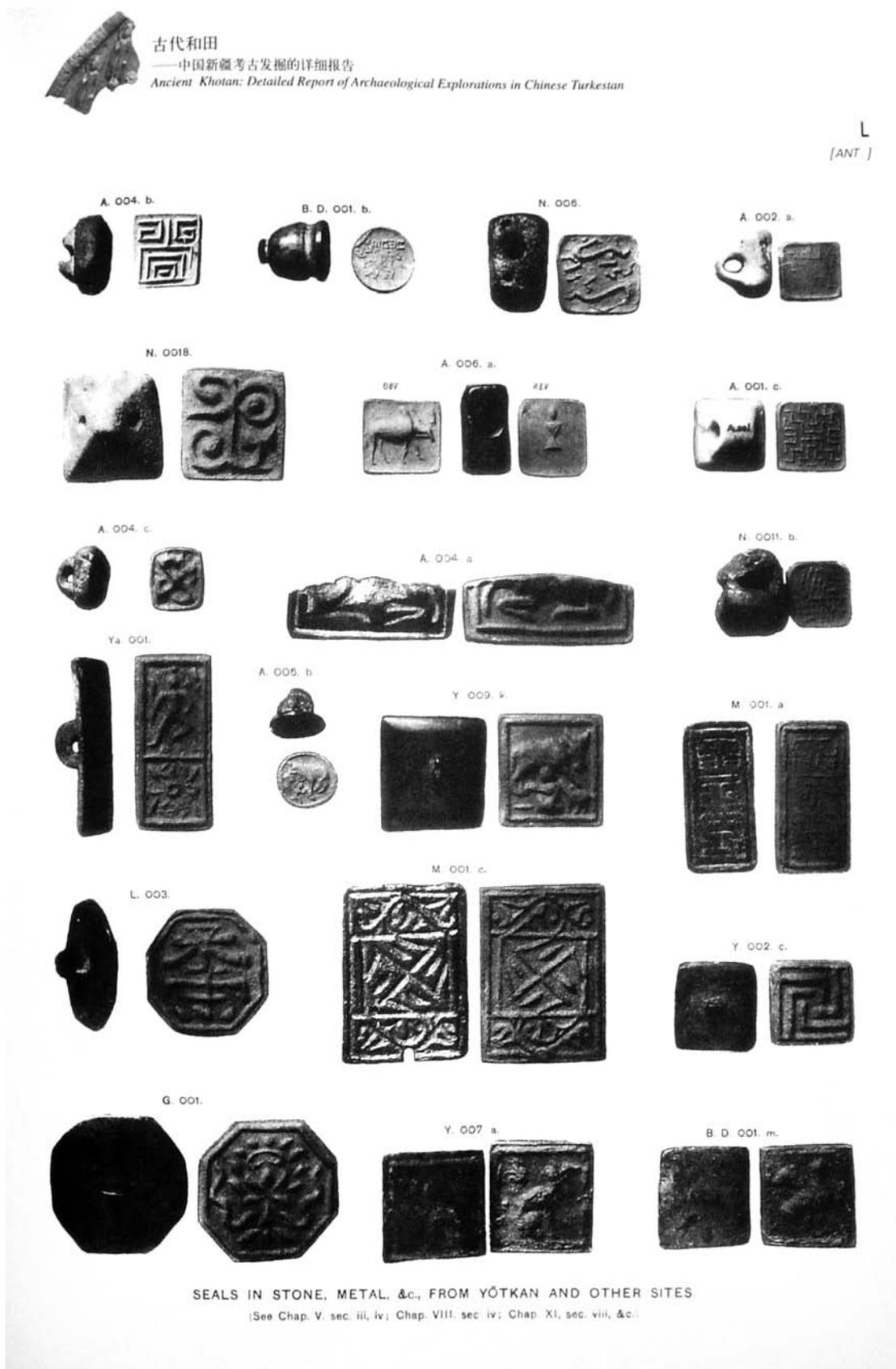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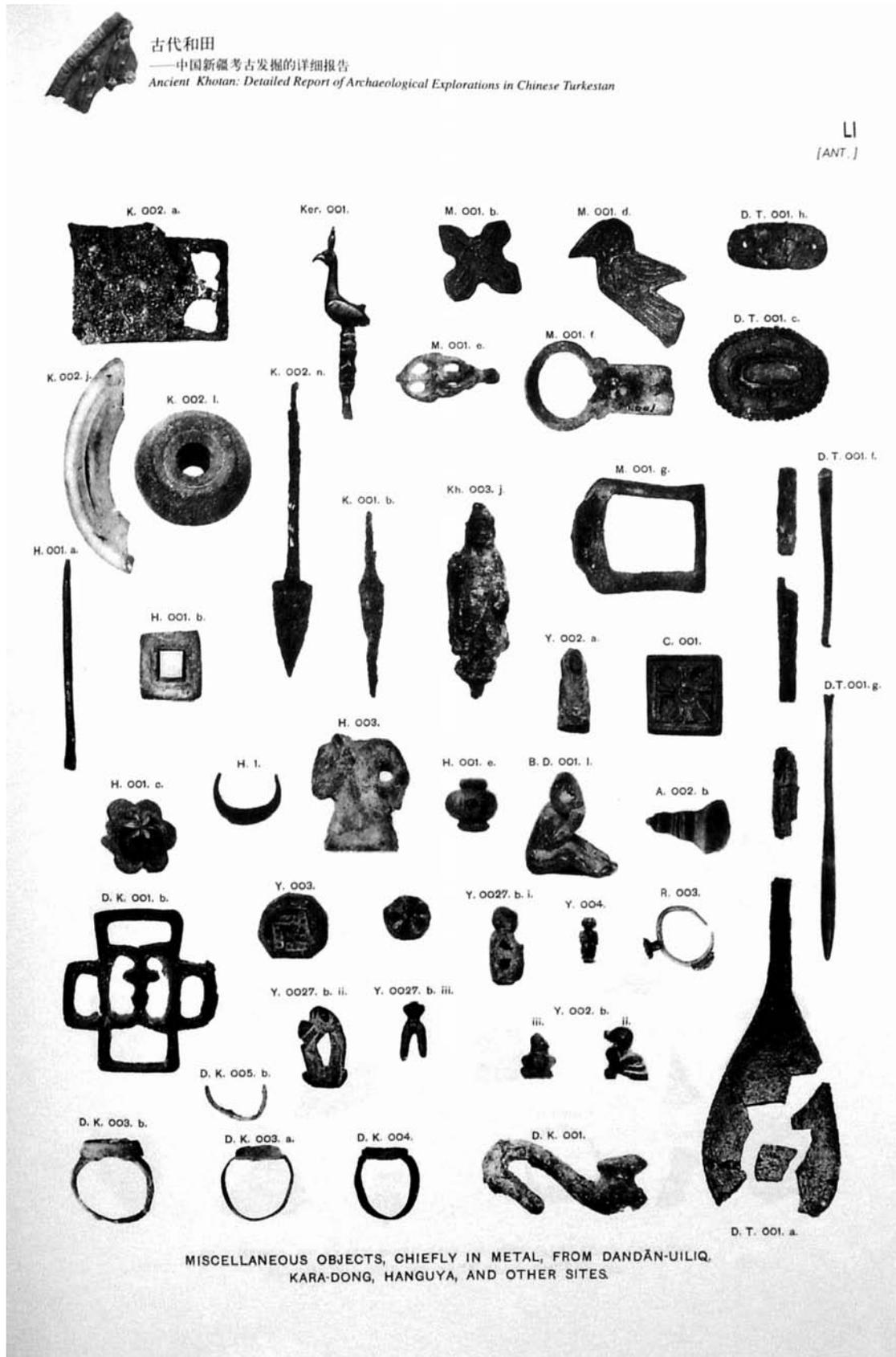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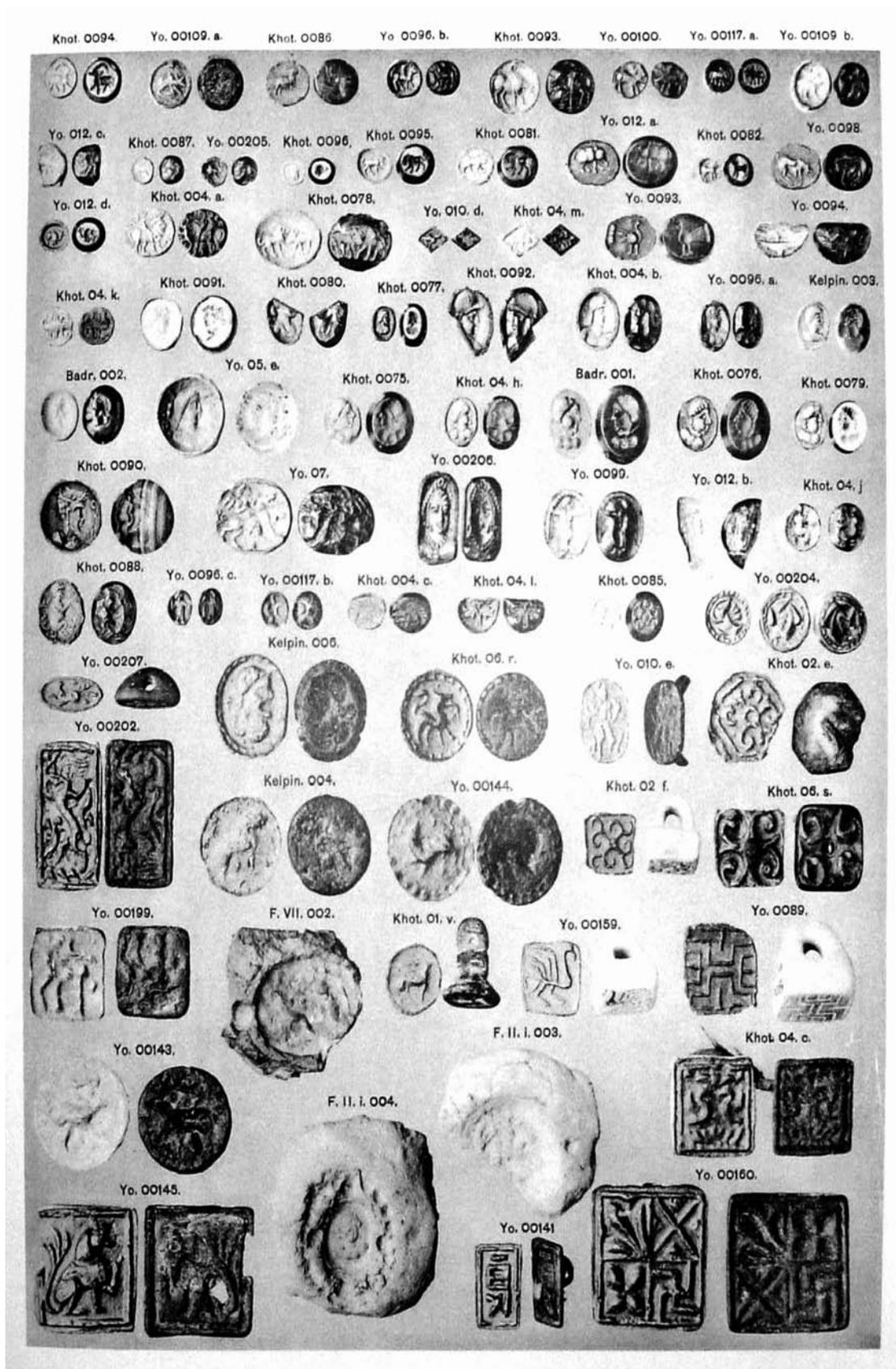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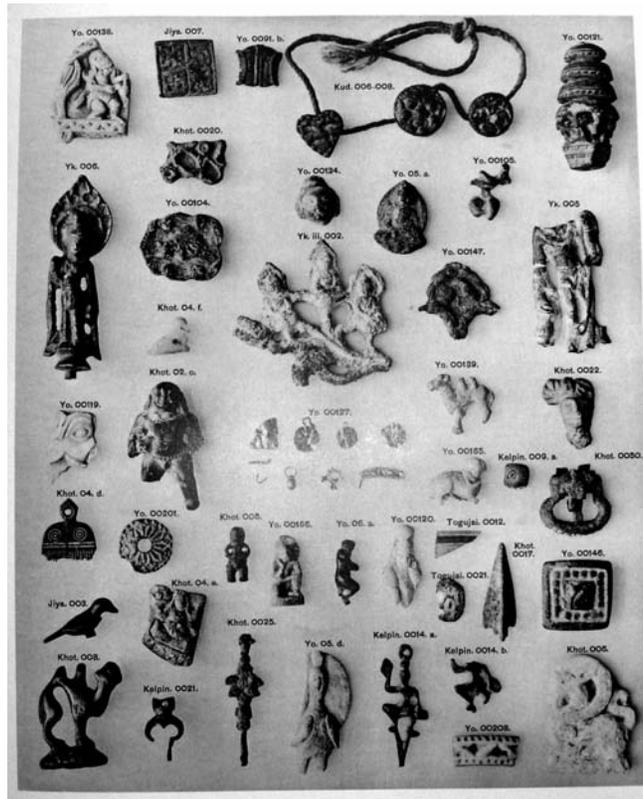


图9



图10

3.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① 记载所获印章（图15—26）

拉勒塔格遗址采集或发掘出的遗物中的印章、卡西木阿洪和其他人带来的麻扎塔格遗物中的印章、据称来自约特干遗址中的印章、从和田镇获得或获赠的古物中的印章、巴德鲁丁汗从不同遗址上采集来的遗物中的印章、托克塔阿洪带来的据称来自阿喀里克和杭桂等塔提遗址的遗物中的印章、在达玛沟附近遗址上获得的遗物中的印章、出自乌鲁木齐吉亚拉特附近塔提遗址的遗物中的印章、在瓦石峡遗址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L.L和L.M.遗址间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在L.M.遗址发现的各种遗物中的印章、C.xc iii.营地和L.A遗址之间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L.A.楼兰遗址及其附近发现的各种遗物中的印章、L.F.围墙内出土遗物中的印章、L.A.西北风蚀地（C.xc iv）上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在烽燧T.XL III.k.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在喀拉霍加购得的各种文物中的印章、在坟墓遗址Kao. III发掘出来的遗物中的印章、在吐峪沟购得的文物中的印章、尤勒都孜巴格诸遗址器物搜集品中的印章、在库车城搜集的器物中的印章、从萨尔沃塔遗址带回来的青铜物件中的印章、从土丘R.R.VIII、IX、XI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在沙依索克赫塔遗址发现的遗物中的印章。



图15

^① [英]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根据译本逐条统计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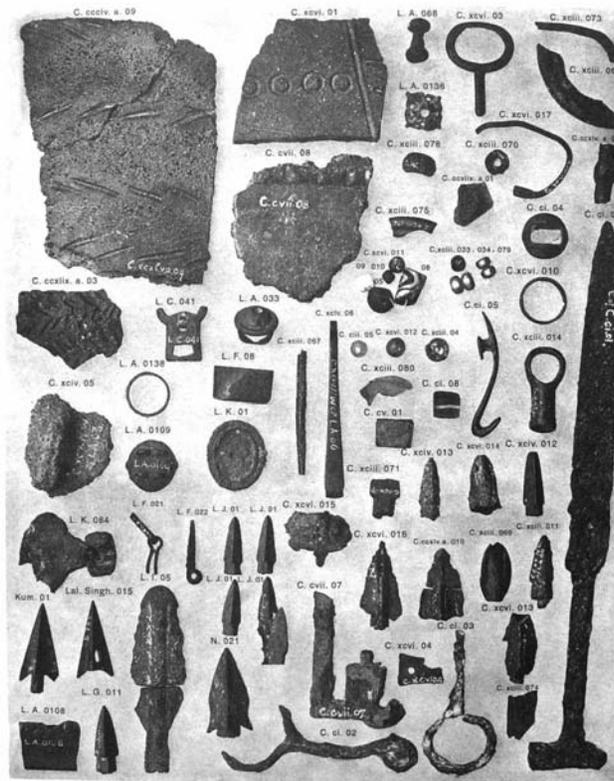


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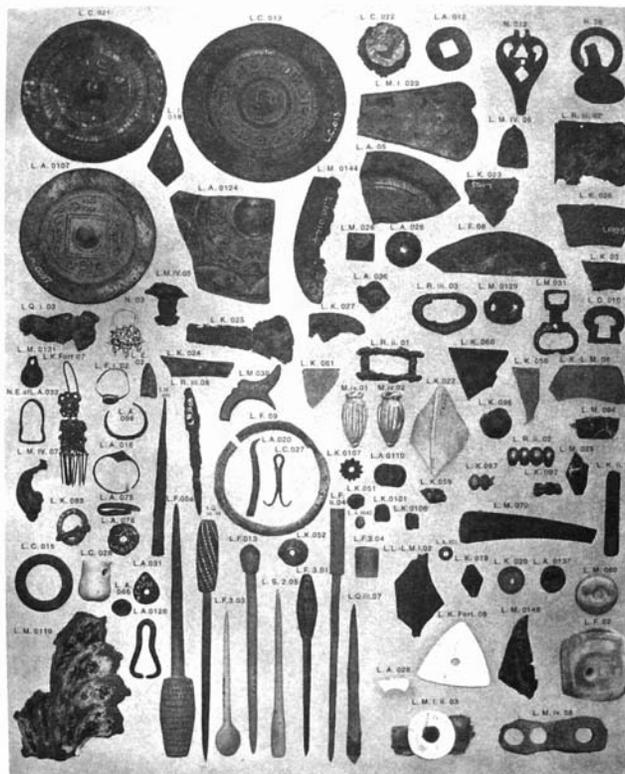


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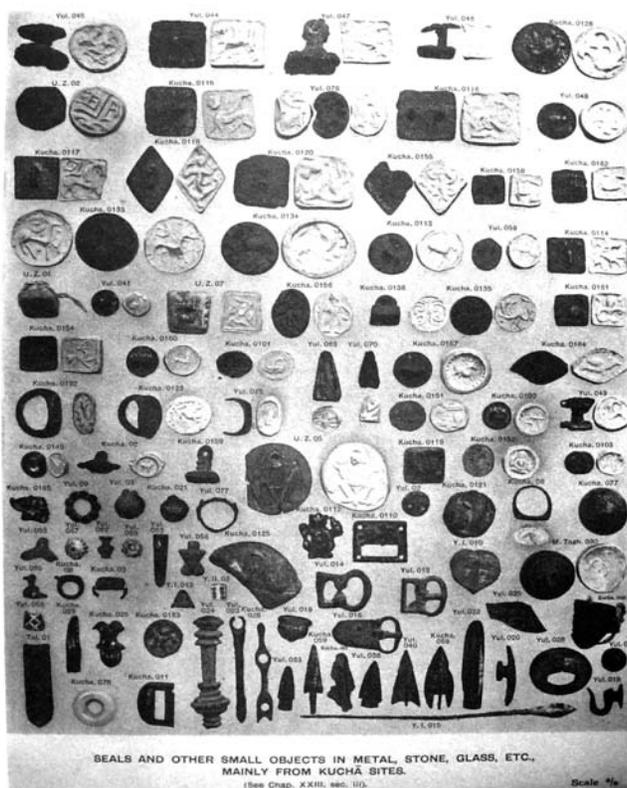


图26

斯坦因所获印章有域外各式印章，风格各异，笔者略述如下：

1. 古伊朗萨珊王朝的印章

萨珊王朝是波斯在公元226年—650年的统治王朝，也是波斯自阿契尼德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当时与中亚的印度贵霜王朝、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萨珊王朝前期建立了不少城市，织布业、成衣业、手工业开始发达，商业也是很发达，出现了商行。其中商行规定，丝织业特别是锦缎制造业，生丝必须由中国进口，而当时中国是三国两晋、由隋而入唐前期，缘此，萨珊王朝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政治交往，这种交往一般通过水路与陆路而开展。水路的交往通过交趾（今越南境内）一直到达中国东部的南方集权中心建康（即南京），如《梁书·诸夷传》有载，波斯国曾于梁大通二年（530）“遣使献佛牙”。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即藏有萨珊王朝卑路斯王时期的直径2.7cm的银币（图27），就是极好的物证。在“丝绸之路”上发现了许多萨珊王朝的器物，如现藏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501）封和突墓的萨珊银盘（图28）、宁夏固原县出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的萨珊银壶（图29）玻璃碗（图30）等。

由于萨珊王朝的旋床研磨工艺相当发达，所以印章多为圆顶形，类似我们食用的馒头，并且中间开一个穿线用的孔，印材料有坚硬的石质，如紫红水晶、玛瑙、玉髓、青金石，红绿宝石等。其内容图案一般以画像居多。画像有三类。一为人物，除国王外，政府官员及高级僧侣的用印上也带有画像，同时还有刻着名字及以示官职的文字。那些肖像有些刻画的是守护神，而非印章持有人自己。二为动物，主要有带有锡西厄风格的前足跪坐的大鹿、狮子等。三为神话动物，如大谷光瑞西



图27



图28



图30



图31



图29

域所获天马印（图31）、拜火教的圣兽，1986年宁夏固原南郊小马庄村史河耽墓（669）出土的现藏宁夏博物馆的天马印（图32），以及人面兽身的牡牛等。萨珊王朝平面印章内容通常有一定的规定，不可任意选择题材。

萨珊王朝的印章另一特点就是，如其钱币一样，圆形印的一周常附有或短或长的一圈铭文（即王朝统治时期的巴列维文字），其内容一般是有着宗教色彩的格言或警句，以及印章持有人的名字或带有公文形式的“已阅”、“正确”等内容。

萨珊王朝的印章中还有一种“萨穆加”（即“记号”），其原始状态是古伊朗高原游牧民族打在家畜身上的记号，以表示对家畜的拥有权。后来演变为家族标记，再后则演变为家族纹章。其图案大多带有类似日月的记号（图33）。

萨珊王朝的印章制作工艺流程是先上车床车出两面穹窿形，有点像飞碟圆饼状，然后一面钻孔，另一面先磨平大约三分之二，再在这三分之二的平面上阴刻图文。笔者认为，那占大约三分之一的印章面积宽圆边是为了在封泥上钤盖时以平整封泥之需，这样就无需先用印规来平整封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直接在其小半球凸形印面上进行刻制的，其效果就是印章视觉上陡然加大。

2. 希腊古典时代印章

林乾良《世界印文化概说》第5章将希腊印归为7个时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腊古典时代的印。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前447—前438）是希腊雅典为纪念战胜宿敌波斯侵略者而建的人类至高

艺术杰作，也标志着希腊雅典黄金时代（前450—前330）的来临。那些华美的艺术作品元素，在当时的指环印制作中也有所表现，并且渐趋华丽。希腊古典印章一般是戒指印，其特点一是画像印，如身裹衣服的维纳斯女神、日常生活中的美少女；二是印章画像上刻有使用人及印章制造者的名字（图34）；三是亚历山大帝东征从印度带来大量黄玉、绿玉等美石，使印章的制作材料愈加美丽、名贵。

我们今天识别希腊印，主要是看其上面镌刻的雕像是否承载着希腊神化人物及其美术雕塑信息。

3. 罗马帝国的印章

“继希腊人之后，强悍尚武的罗马人成为欧洲古代奴隶社会美术舞台的主角，罗马的艺术是欧洲古代世界美术发展的最后一幕，一如落日夕照”。

罗马是古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其城邦据说是由孪生兄弟罗穆路斯（Romulus）和瑞穆斯（Remus）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建立的。因古罗马为“共和时代”和公元前27年1月16日后开端的“帝国时代”，故印学界有将“罗马印”（图35）分为四个时期之说，即“共和时代”早、中晚时期和“帝国时代”早、晚时期。

罗马人是从希腊人的一支伊特鲁尼亚人那儿学会使用指环印的，不过伊特鲁尼亚人喜欢使用材质华丽的印章，如红玉髓。而早期罗马人只使用铁制的指环印章，这便成为罗马印章的第一大特点。此后随着罗马的强大，奴隶主如元老院议员贵族等被允许使用黄金的指环印，而平民用银印，奴隶则用铁制的了。另一特点是，印章内容多采用肖像。如古罗马凯撒大帝将自己的指环印刻上“阿芙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人们常说的“断臂维纳斯”，大理石原像现藏法国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罗浮宫博物馆)。还有一个特点是,罗马印章有明确记录印章制作者的名字,这也是世界仅有的现象。如生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狄奥斯库里得斯(Dioskourides)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也均是著名的雕刻家。此外,罗马印章是以指环印形制出现,不像我国基本为平面印章。

4. 印度风格印章

公元前后的西域,受印度佛教的深刻影响,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印风不可避免地传入西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彼时的印度政治体系在近千年时间里跨越了孔雀王朝—贵霜时期—笈多王朝,其印章也是自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印章”(图36)消失、经过相当长的黑暗期后,再次因孔雀王朝(前322—185)的兴起而兴盛。当时的印度受到伊朗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前550—前330)强大的文化刺激,比如印度的佉卢文可能是在公元前波斯人统治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时从阿拉米字母演变出来的^①,造币与制印亦是如此。同时,由于战争和商贸业的巨大发展,印度文化也深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

林乾良《世界印文化概说》第10章“伊斯兰教之前印度的印”将此时期的印史分为五个时期,并认为“西方对于印度印学的影响在公元的最初三个世纪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使得研究印度印的特性和确定其产地变得不大容易”。^②

它的第一时期用宝石、板岩、玻璃或铜刻制的“印度—伊奥尼亚”(Ionian)特征和希腊—波斯类甲虫印,其图像是与冲制的硬币图案相近的人、动物雕像。

第二时期已进入库三时期(前3—前1世纪)的印大多为方形或圆形形制,上有婆罗门文字或图案,材质为象牙、玻璃、石头和烘焙的赤陶,印柄大多为环形或球形,或有孔或无孔。

第三时期是成熟的库三时期(前1—3世纪)印,但受罗马影响甚重。其印章图案类罗马风格但属于本地造,是“甘得哈拉”(Gandharan)保护神,形制大多也非戒指印。

第四时期的笈多王朝时期(320—540)印,深受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

由此笔者认为,该时期的“丝绸之路古印”,与彼时的印度印章同样面对混杂而多元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之处有如下两点:

一是来自秦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控制,中原文化元素重于其他外来文化色彩。

二是多元文化艺术元素注入印度印文化后,又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我国新疆地区,所以我们的“丝绸之路古印”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印度文化色彩,比如“瘤牛印”、“孔雀印”。奇怪的是,该时期的印度本土印中这种题材反而鲜见。究其原因,笔者猜测:一是在印度本土还没有被印度印研究者发现,但其实已经存在并传播到西域了;二是希腊、罗马人将印度文明的信息刻制进印章之中,带入西域;三是西域当地人刻制(追刻)的存有印度信息的印章。总之,这是一个“悬案”,妄下结论是不科学的。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发掘、比较和研究,方可得出结论。或许我们目前只看到了“现象”、并没揭示“本质”。

需要说明的是,斯坦因所获“丝绸之路印”中的萨珊、希腊、罗马、印度风格的印章,连同他发掘的绢画、简牍、封泥、木雕等,已经无可争辩地向世界首次表明,古伊朗、希腊、罗马、印度文化等已经对遥远的中国西域产生了影响,虽然西方研究家们由此而企图将我们的新疆置于中国版

^① 但是没有发现这种演变的确实证据。

^② 林乾良:《世界印文化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图之外。但是，斯坦因所掘的西域中汉人的许多政治、军事、法律文书已经说明，西域的实际控制者是中国的秦、汉王朝，这些西方的器物包括印章等，只能说明西方贸易商人承载着他们的文化信息，传播到中国的新疆。

（二）新关钦哉的整理

曾为日本国驻澳大利亚、苏联（兼外蒙古）、印度大使，同时也是印学家的新关钦哉氏，曾著《印鉴的文化史》（PHP研究所出版）、《印学者开端》（NHK BOOKS 出版）、《东西印章史》（东丘印社出版）。笔者现根据其《东西印章史》有关“丝绸之路印”加以整理：

新关氏首先介绍了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当年斯坦因在我国丝绸之路上高昌古城收集的印章。作为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的斯坦因，“印度学家”是其众多头衔之一，当年经克什米尔而进入新疆。笔者查阅了斯坦因的游记如《沙理和田废墟记——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纪实》、《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等等，以及他的三套计十一大卷本的考古报告，得知其所获文物基本运进了英国大英博物馆，但存于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的收藏，笔者还是首次获知。

《东西印章史》载：“斯坦因在高昌古城收集的印章现为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收藏。全部共有37方，铜印为17方，石印为（红玉髓、玛瑙、石榴石等）有17方，其它玻璃制2方，骨制1方。方形印多于圆形印。图案大部分为几何学图形，也有的刻有动物图案以及与汉字相似的文字。年代为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之间。”^①关于这段表述，新关氏所据为《Stein, A,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发现我国楼兰古城遗址的斯文·赫定（日本新关氏称“斯文海定”，1865—1952）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在瑞典本国与诺贝尔齐名。他早于斯坦因10年并曾5次来到我国新疆，为当时的南京政府计划中原入疆的铁路建设而进行地理勘察。关于他在我国新疆所得的印章，我们国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记载，但《东西印章史》载：

“斯文海定于1896年在高昌古城得到的印章现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民俗博物馆。共有58方，其中也有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物像，但大部分是属于伊朗系统的印章。全部都是圆形的石印（青金石、红玉髓、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等），没有一方铜印，年代为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之间。”^②

这些资料新关氏的依据是《Osten, H., Geschnittene Steine aus Ost-Turkestan im Ethnographischen Museum zu Stockholm (Ethons Nos. 1-4, Stockholm, 1952)》。

斯坦因的中亚考古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由太平天国一个将王的女儿与英国人结合生育的）的大力帮助，而马继业与俄罗斯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为得到在新疆的利益明争暗斗。喀什噶尔即今新疆的喀什，是古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东北脚下的一个绿洲，翻过高原就是塔吉克斯坦、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所以号称“五口商通八国、一条古道连欧亚”，是古“丝绸之路”的喉舌。马继业有斯坦因帮助搜宝，而俄罗斯利益的代表者彼德罗夫

① [日] 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东丘印社2003年版，第24页。

② [日] 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第24页。

斯基则自己亲自收集。彼德氏收集的一些“丝绸之路印”，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日美术馆，这些藏品，新关氏在《东西印章史》中写道：

“笔者曾经亲手查验过这些印章，据当时的记录（新关氏可能根据其在俄国任大使时的日记记录，他著该书已经是多年后的事情了。——笔者注），属于库车这个地方的印章中，有骆驼钮印章、刻有‘王’字的印章、椭圆形的刻有动物像的大铜印等。

彼德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印章中有石质的两面印、带有‘寿’字的圆形铜印、刻有文字似汉字的指环印、刻有‘吉’字的玉印、刻有人物像的红玉髓印章、动物像的铜印（方形圆形各一方）、刻有似维吾尔语文字的铜印等。

据当时美术馆负责人的解说，年代为三世纪到五世纪之间。”^①

就日前笔者所掌握的印学知识，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搜集于库车这个地方的“丝绸之路印”，有“骆驼钮印章、刻有‘王’字的印章”。试说：公元3—5世纪，正是中原的汉末至魏晋时代，当时的汉人中央集权确实向边陲少数民族如胡王、羌王等授了不少马钮、驼钮等王印，它们一般为铜质，也有铜鍍金、银质等等。新关氏所见这方印极有可能属于这类印章。

“椭圆形的刻有动物像的大铜印”，显然是“丝绸之路印”，是否类印度艺术风格的萨珊王朝印，或是什么风格的印章，只有见到实物或图片才能判断。

彼德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印章中有“石制两面印”，这应不是我们的汉章。

“带‘寿’字的圆形铜印”，我们的汉章中圆形铜印一般为战国印，带“寿”字者有“长寿”吉语印或小私玺如“张寿”、“陈寿”、“李寿”等，如果是仅一“寿”字者似乎不见，这是否是元明清之季的西域人或汉人所铸、有着护身符性质的吉语印？待考。

而刻有“似汉字的指环印”则非中原的汉章无疑，这应是东西方印章杂合的典型代表——“丝绸之路印”的主格，由西域人自己生产的印式。

“刻有‘吉’字的玉印”，应是中原风格的汉章。

方、圆均有的动物像的铜印，则东西方印章均有可能。

总之，艾尔米塔什美术馆收藏的彼德罗夫斯基在新疆各地收集的庞杂印章，我们现在只能得知中国风格、罗马风格、伊斯兰风格、波斯风格均有，因那儿为极早的沙漠之地，故无法如中原地区用所谓“包浆”之类的经验进行断代，到底是“丝绸之路”上川流不息的商侣携带而来还是当地西域人仿照各式风格而自制，从科学的客观的而不是臆说的角度来考察，应是无法解决的答案。艾尔米塔什美术馆负责人解说是3—5世纪的印章，这一判断显然过于轻率。

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生于京都，通晓中国历史，深谙汉学。1899年1月至1901年之间，年仅23岁的大谷借“寻佛之根”，用了四个半月探访中、印、英、德、法、俄，参观了各国博物馆，接触了斯坦因等人，看到了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新疆掠走的文物，十分震惊，于是步其后尘组建了以佛教徒为主的探险队。如果说欧洲人探险仅限于中亚（即新疆地区）的话，那么，大谷探险队则将触角扩大至整个西域（即我国西北广大地区）。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大谷氏先后三次亲率橘瑞超、渡边哲雄、野村荣三郎等18人，历时5年11个月，在我国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

^① [日] 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第24页。

等40余座城镇，通过乱挖、乱掘切割及以古董贩子身份出现，雇用当地百姓破坏遗址，疯狂盗掘。1905年5月，橘瑞超在楼兰古遗址发掘了斯坦因所编的LA遗址，获得《李柏文书》——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有正史记载的人物（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于公元324年书写的纸质信件草稿。^①

大谷光瑞、橘瑞超的所获，大部分流入韩国、日本，一部分又反流入中国旅顺，该事件详见我国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汉城中央博物馆珍藏之新疆文物》。^②

《东京国立博物馆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展》（东京，1971年）图版第146—152页所载31方西域所获“丝绸之路印”，新关氏《东西印章史》介绍“既有刻‘张’‘O福’等汉字的印章，也有刻几何学图案以及图案化的文字的印章。还有动物印章。其中一枚铜印上刻有精致的天马图像”。

这些印章的年代不明，但是依据其材料、形状、印钮及印面可分类如下^③：

a	材料	铜制	26	木制	5
b	形状	正方形	19	长方形	3
		八角形	1	圆形	5
		椭圆形	2	星形	1
c	印钮	鼻钮	24	动物钮	1
		变形钮	5	两面印	1
d	印面	文字	14	画像	9
		几何图案	6	不明	2'

至于大谷存放于中国及韩国的所获品中到底有多少方“丝绸之路印”，这至今还是一个谜。

至于我国考古文献及美术类刊物所载有关“丝绸之路印”，现在国内的研究收集工作尚没有形成系统，大多是零散的或是专题性、小范围的研究。

黄文弼是我国西域研究的专家，他在土垠遗址湖滩边仅百步之遥拾得汉五铢钱、铜矢镞、汉印一方^④，这些遗物与土垠遗址年代一致，故应也是西汉之物。印文黄文弼先生识为“韩产私印”（图37），该印红铜质，方形瓦钮，边长1.7cm，高0.9cm；对照图版比例，笔者臆为“台高0.9cm”，阴文，是标准的汉印。“韩”字笔者起先存疑，经查《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与《石门颂》“韩”字合，故黄释不误。又，黄臆韩产为人名，可能是驻守烽燧亭之侯官，臆想成分有偏。其实，中国的文化人在治学的时候往往过多地关注了人文与官位皇权，而不从经贸商业的角度研究问题，如谓带动世界向前发展的商贸人士为“射利之徒”，这其实是我们文人治学中的一大缺憾。再谈这“韩产”人士，为什么不能是从中原而来的丝绸商人呢？顺便提一



图37

① 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② 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汉城中央博物馆珍藏之新疆文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9页。

③ [日]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第25页。

④ 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48年，第132页。



图38

下，如果没有繁荣的商业，便没有丝绸之路；便没有美术史上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等；也不会有建筑史上的徽派等等。

1959年，为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中国文物部门首次对尼雅（民丰）进行了考古发掘，史树青先生在民丰县采集到“司禾府印”一枚（图38）^①，现为该馆收藏。该印碳精质，边长2cm，通高1.6cm，桥钮。钮桥雕为伏卧螭虎一只，阴文，文字正刻，钤出后为反文。现我国有关刊物及史先生本人均目为“司禾府印”，理由是秦时西域有“宜禾”之地，缘此，该印成为我国印学史上特殊意义的著名汉印。但笔者仔细验之，发现其多有与汉制不合。其一，质材，汉官印中没有碳精质类目，铜官印便于久用不坏，而碳精极易碎破，不应是为官之用；其二，汉官印有严格的授印制，该印四字均反文，不合汉印制；其三，“禾”字误，是否为它字，待考；其四，钮制之形也不合汉印制，倒有点类战国与汉初镜钮；其五，四字书法风格特别是“府”、“印”不合汉缪篆，类明清印人所书小篆；其六，用力契刻有明清及民国文人篆刻习气，与汉代印工契刻不合，这是重要的一点；其七，史树青先生考在《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

注及东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中皆有“宜禾都尉”之职，而断该“司禾府印”为汉印，显然牵强；其八：该印征集而来，与出土的关系似是而非，因此在断代上无法确定，或汉代西域人仿刻中原官印？或后人仿刻？总之，先前的“研究者”均是考古学家，对该印定为汉印似乎已是盖棺定论。其实这些“研究者”对真正的治印尚存隔膜，在此将该印介绍给印学界同道讨论，笔者以为将其确定为汉印是缺乏说服力的，是不科学的。

对于斯坦因所获如此众多的“丝绸之路印”中的图像印，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现在已经发掘或研究过的肖形印。

198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收录有新疆库车、拜城附近出土的汉代铜印24方（图39）。在他的《非“唯汉人有之”》^②一文中，王伯敏又谈到了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文中也收录并研究了新疆沙雅出土的多枚铜质肖形印（图40），以及敦煌博物馆收藏的1957年出土于阳关汉代而非汉人之墓的一枚“丝绸之路印”，该印铜质、桥钮，1.6cm正方，台高0.8cm，通高2cm，为“龙形”或“走兽形”肖形印（图41）。该文中他还刊出了尼雅出土的现藏新疆博物馆的4方肖形印（图42）。另，《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共收录了303方肖形，因许多印没有明确的出土地，如果要将其中的“丝绸之路印”检出，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其中存在有大量的“丝绸之路印”，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肖形印的重大作用，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的观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归纳如下：第一，肖形印不是平面雕刻而是浮雕，因而不得钤压纸上而是钤压泥上；第二，肖形印的图案与传统的中国图案不同，多带有异国情调，如骆驼、河马、大象、犀牛、鸵鸟等均非中国鸟兽，特别是锡西厄民族的工艺品常见构图前腿弯曲跪伏的大鹿肖形印，总之，新关氏的观点是：

①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② 《印学论丛——西泠印社九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



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肖形印属于西方系统这一点是容置疑的。”^①

他的解释是西方出现的肖形印大约在战国初期从西域传入中国，从而中国人学会了使用印章及封印，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置入汉字，再制定材质，钮式，授绶，从而形成官位用印制度。

“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印章原样地被中国接受，但是使用印章的习惯首先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也就是说，在软泥上钤盖印章以保持财产及文书的风格，可能是通过东西方贸易中被带入中国的物品上的封泥传入中国的。……它可能是属于一种‘刺激的传播’（Stimulus diffusion）。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印章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②

① [日] 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第20页。

② [日] 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第29页。

二、研究“丝绸之路古印”的意义

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丝绸之路古印”存在于我国以新疆、甘肃为主的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应属我国印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不容怀疑的，其中包括有中国、希腊、罗马、伊朗、伊斯兰、印度等不同国家、地域和文明的印文化信息，并不能说明它们全都是产生于西域之外而带入西域的印章。因西域本土有四千余年的青铜文化^①，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消化吸收并和自己的本土文化相糅合产生的带有各式信息的文化艺术品，当然应当属于大中华文化家庭中的一员。从这一观点上说，“丝绸之路古印”中的一部分由新疆（或称西域）当地人所制造的带有西方、西亚等文化色彩的印章，当然就是中国印大家庭中的一员。由此，“丝绸之路印”一词应是成立的，至于到底如何称谓，希冀我们的印学界展开讨论。

研究“丝绸之路印”的意义，概言如下：

（一）有助于了解世界印式的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包括“各种文明”的印章的起源、格局、印章传播关系、印的内容（图式、文字）、形制、材料、使用方法等。

（二）有助于了解由印章而扩大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印章承载着宗教、美术等诸多文化信息。如研究萨珊王朝的印章，必然要对萨珊王朝的政治、文化展开了解。具体举例；斯坦因西域所获的“瘤牛印”，显然是印度“瘤牛”神话崇拜的物质实证，起先笔者认为“印度河印章”的“流播”产物，如果是的话，则说明早于西汉两千年的古“印度河文明”达罗毗荼人（世界考古学界大多这样认为，但不是确定下来的结论）就已经从印度河西北上游经过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古道一段路途而后北上，再越过克什米尔进入我国的新疆了，再加上斯坦因在尼雅发掘的大量印度贵霜时代佉卢文简牍，似乎说明在汉以前的两千年之内，新疆地区一直由印度人统治一般。正好，笔者在撰此文时同时也在撰《“印度河印章”读识札记》一文，由此而能轻松地解释原来这方印虽是“瘤牛”图案，但不同于四千年前的“印度河印章”体式，它可能是在印度内战中溃败的一支贵霜军不远万里逃至新疆尼雅一带并受雇于我国西晋王朝的军人所携带的印章，或者是印度的商人经丝绸之路携带而来的，总之，这方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具体物证。

（三）有助于对中国印章起源的再认识

日本新关钦哉1995年出版、今村光甫2003年译成中文并在西泠印社百年社庆时每人派发一本的

^① 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东西印章史》，其中开篇“中国印章起源考”中明确提出“肖形印属于西方系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以及“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印章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两个观点，但竟未引起中国印学高地西泠印社同仁们的一点反应，给国际印学界的感觉是似乎大家都在默认他的论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界的麻木，也是笔者写就本文，为同道提供现象进而希冀大家深入研究、不以感情色彩而以科学态度加以客观对待的目的。

笔者认为：“丝绸之路古印”的断代将是一个恐怕在现阶段、甚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尚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西域沙漠为极旱之地，所以物品易于保存，可逾千年而无变化，如斯坦因所掘的大量汉晋简牍、佉卢文简牍，越两千年而笔墨均似昨日之物。所谓年代久远造成的文物岁月痕迹之说，相对于“丝绸之路古印”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如西汉“万石”印（图43），宛如刚刚刻就。或可说，这些印章是“真旧物伪新物”。因而，以上的大量“丝绸之路印”不能轻率地确定为秦汉晋时代之外，此其一。另外，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在西域征集的大量非发掘品“丝绸之路古印”，作为来源于丝绸之路中通五海连八国的重要通道的新疆，或可说，这些印章可能就是“伪旧物真新物”。譬如，《古代和田》第15章第1节就记载了当地新疆人伊斯拉木·阿洪如何造假古书册的事件，此其二。总之，“丝绸之路古印”的年代鉴定恐怕永远是个谜。而新关氏简单地将“丝绸之路古印”定为汉代及战国之物，由此认定我国印章起源于西方，显然又是一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鼓吹者。

总之，“丝绸之路古印”应是我国印学领域的重要一支，这一点，笔者认为是无须质疑的，至于如何研究它的名称则尚待讨论。笔者将关于“丝绸之路古印”的研究导入当代印学研究范畴，是期望我们的印学研究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课题，本文仅仅是抛砖引玉，真诚希望同道们携手共进，努力推动我国印学研究深入发展。

（作者系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委员会副主任，二级美术师）